

纪念丁光训

[加拿大]白理明 著

马 佳 译

(K. H. Ting 是丁光训海外通用的称呼。这个拼法是基于早期罗马式的拼音和国际通用的姓在前,名在后的方法。丁光训的外国朋友习惯亲切地称呼他 K. H.。)

丁光训的一生经历了中国和世界历史上至关重要的一个世纪。他出生于清帝退位的几年后,他的童年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五四”运动、孙中山和蒋介石的崛起、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军阀时代。他在上海成长,在母亲的劝导下成为基督徒,并度过了“二战”中上海被日军侵占的“孤岛”时期。这个阶段,他已经成为一个年轻的国际主义者和爱国者。

1946年,丁光训和妻子郭秀梅应基督教学生运动(SCM)的邀请,前往多伦多。他们的足迹遍及整个加拿大,在此期间,他们访问不同的大学,参加各种学生的集会和活动。他们富有成效的工作,使得他们和大学生们建立了牢固的联系和亲切的友情,因为对学生们深刻的影响,夫妇俩至今还会被记起和谈论。

他们在加拿大的工作影响了整整一代的加拿大大学生,与此同时,也打开了他们夫妇进一步获得国际经验的大门。在他们结束加拿大一年的

合约后,丁光训进入纽约协和神学院学习,而郭秀梅则成为了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的学生。在纽约,他们依然非常关注中国的内战并为自己的前途担忧。丁光训取得纽约协和神学院的硕士不久,他们的大儿子也出生了。这时,丁光训得到了位于瑞士日内瓦的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干事的职位。在这个位置上,他有机会在世界各国旅行,并和欧洲已经开始的冷战双方的基督教学生团体保持着沟通和联系。他还得以在欧洲和吴耀宗会面,从中了解到了新近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详情。

丁光训和郭秀梅不得不决定是返回中国,还是留下来在西方生活。有些基督徒朋友劝说他们不要回去,担心他们一旦回国,会被投入监狱或集中营。另一些朋友明白他们夫妇俩想成为新中国的一部分。1951年,丁光训和郭秀梅带着他们的儿子丁言仁从日内瓦去往香港,然后坐火车先到广州,最后抵达上海。从此,他们安顿下来,并在迅速变化的中国开始了他们创造性的工作。

把丁光训看作是中国在20世纪后半叶最重要的中国基督教新教领袖,这样的观点一点不为过。他的国际经验,他对中国和中国教会的爱,他敏锐的智慧和组织能力,对中国教会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关键的三十年,以及之后全然不同的后三十年的作用都是无可取代的。

在中国,基督教教会长期被看作是“西方的”、“外国的”,并成为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代名词。丁光训意识到要改变这样的历史,必须创造一个真正属于中国基督徒的中国教会。其实,基督教并不是个欧洲宗教,它起源于西亚。丁光训常说,中国教会可以在文化上是中国式的,就如同英国教会是英国式的。

50年代的工作围绕着发展一个爱上帝、爱国的基督教团体。中国的圣公会任命丁光训为主教。之后,中国的基督徒决定超越西方的基督教流派而建立一个统一的机构。1952年,丁光训开始担任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的院长,他这一当就是五十年。这个神学院在“文革”中关闭了若干年。

从1951年到1979年,丁光训的领导作用主要集中在如何帮助中国教会适应革命变化的环境并在其中生存下去。1949年之前,国外的资金和

人员的支持对维持教会的运作非常重要。现在教会要尽快地发展自己的行政领导团队,自己筹集资金,自己承担建设教会、服务社会的职责。重中之重的是,如何让在爱国主义层面下支持社会主义新中国这样的观念来取代以前很多传教士反对社会主义的观点对中国教徒的影响。

我个人和丁光训的接触开始于70年代。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和我已故的妻子瑞(Rhea)居住在香港,我开始认真地关注丁光训,虽然我们都没有曾和他谋面。1971年的“文革”期间,我们作为进步的学者应邀参加了一个代表团访问中国。在南京和别的城市,革委会给我们介绍每个城市主要的学校和大学,在南京的介绍中,还提及了一所神学院。既然在“文革”中所有的学院都被关闭了,我们也就没有可能去参观。后来我们才知道,金陵神学院在当时曾被当作当地红卫兵组织的总部。

1973年,一位加拿大的基督教领袖访问了中国,在途经香港时,告诉我们在南京他见到了丁主教,他说丁主教现在已经部分地出现在一些公众场合,虽然当时的金陵神学院还没恢复开放。我们就从香港写信给丁主教,告诉他,我们对了解当时的中国状况很感兴趣。我们也主动请缨,说我们可以通过在中国以外的教会机构将一些评论中国状况、推测中国基督徒生活的资料寄给他。丁主教回信让我们这么做。

那些年,海外不少基要派和保守的福音派基督徒乐于散布关于中国和中国教会极负面的消息,并且号召将《圣经》偷运进中国,谴责那里无神论的政府。我们写信给丁光训,问他是否要我们把这样敌对的材料寄给他。他的回答是肯定的,并说他对这样的文章特别感兴趣。

1976年,我和我的家人从香港回到多伦多。我开始担任加拿大教会联合会加中委员会主任。1977年,作为加中友谊代表团的共同负责人,我带队前往中国,在南京,我第一次和丁主教会面。他邀请我去他家晤谈,并请我和我的家人一同共进晚餐。从那以后,我们一直保持着通信往来。

1979年以后:流金岁月

1979年,应加中项目的邀请,丁主教在加拿大进行了长达六个星期

的旅行。他访问了加拿大不同的地方,与 1946—1947 年在他担任基督教学生运动领袖期间结识的老友旧朋重聚长叙。他在我家花费大量的时间准备他在加拿大各地的演讲和布道。在渥太华,我陪他出席当时的加拿大总理以及其他国会议员参加的晚宴。他重访多所大学,会晤了许多教会领袖。

正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开始商讨召开一个国际会议的可能,因为这样的话,可以给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教会领袖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我们同意只邀请尊重中国教会的代表。最终在 1981 年的蒙特利尔,来自世界各地的基督徒和天主教徒济济一堂,共襄盛会。来自中国的五个基督教新教领袖和四个天主教的主教组成了中国代表团。会议的主题是“中国和教会:新的开端”。这次活动的成功也进一步提升了丁主教的国际形象。在随后的几年里,他访问了很多国家,包括日本、菲律宾以及其他亚洲和欧洲等国家。

在蒙特利尔会议和之后我对中国的访问中,丁光训和我讨论是否可以出一本他的英文论文、布道文和演讲文集,他的目的是让中国以外的读者能够了解一位中国基督徒的神学思想和感悟。我编辑了这本 1981 年出版的文集并为之撰写了前言。以后,又陆续有丁光训其他的中英文的选集和文集出版发行。

1980 年,丁光训和郭秀梅的加拿大朋友发起了一个计划,推荐他们夫妇为荣誉博士学位的联合候选人。多伦多大学的维多利亚大学下属学院以马利神学院采纳了这个提议。于是,1989 年,在阔别加拿大四十年后,郭秀梅再次来到多伦多。那次旅行,丁光训一直陪着坐在轮椅上的郭秀梅,很多朋友联袂不断地来看望他们夫妇俩,庆祝他们一生的贡献。丁光训夫妇在 20 世纪 40 年代出色的工作使得当时基督教学生运动的活跃分子至今记忆犹新。

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以下简称“金陵神学院”)于 1981 年恢复办学。这以后的三十年中国教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丁光训领导着中国基督教协会和“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大力发展教会建设。在此期间,

许多教堂重新开放,新的教堂不断地在建立,通过神学院培养了一批批不断扩张的基督教社区所需要的教牧人员——这样的工作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任重道远。丁光训还创立了爱德基金会——一个公益性的社会服务机构,由基督教领导人和其他方面的知名人士组成,他们同舟共济,为解决社会上的焦点问题而共同努力。

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70年代,教会的主要使命是如何适应环境,在新的社会秩序下形成切实可行的自我认定。尽管困难重重,但中国基督徒开创了一个不再隶属于外国的教会。但后三十年的任务则不同,那便是如何让一个蓬勃发展的教会组织运行在健康良性的轨道上。在这三十年里,丁光训在一个别人都已经退休而安度晚年的年龄上,依然给中国教会提供了富有智慧和远见、并且成绩卓然的领导。

妻子和我2000年退休后,同时被邀请在菲律宾的萨利曼大学三一学院任教。2001年,我们去南京探望丁主教,他当时在医院养病。当听说我们在菲律宾义务教学后,他说我们也可以在中国这样教书。当时,金陵神学院还没有外籍教授。他觉得神学院有支持中国“三自”精神的外籍教授将是对中国神学教育的重要贡献。他在病床上把手放在我妻子瑞的肩上说:“我可以依靠你,对不对?”

这样的邀请当然无法推辞。从2002年到2007年我们每年都在金陵神学院教书授课。K. H. 会定期地来到我们位于五台花园的居所,每次一个小时,我们的话题从神学院的教学,到中国教会的状况,包括国际时事。如此经年已久的友情让我们备感荣幸和快乐。

丁光训的遗产

丁主教热爱他的国家而且也毫不犹豫地支持1949年以后的积极变革。他和他的家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三年从西方返回中国便是他们对自己国家和中国教会承诺的象征。

他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是一个爱国者。他长期服务于中国政协并积

极投身于统一战线的工作。他的行为显示出作为一个基督徒并不需要反对新中国。终其一生,他支持用中国文化的形式表达基督教,无论是在音乐、艺术、崇拜仪式还是建筑上。

他对祖国的爱并不是狭隘的大国沙文主义。他一直是一位国际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位向世界介绍中国的杰出使者。他的英文演讲生动雄辩,胜过许多英语为母语者。听他的讲话是一份享受,因为他优雅的风格、清晰的思辨和他的听众能产生深刻内在的交流和共鸣。

在“四人帮”垮台后不断变换的情形下,他的沟通和交流技巧愈发引人注目。在1977年给我的一封信中,他写道:“这里的生活的确每天都让人激动。人民看上去正在经历一次新的解放。当我们还沉浸在毛主席无可挽回的去世所带来的预料中的沉痛时,大家几乎不敢相信充满希望的未来远景会很快实现。人们不难意识到,如果‘四人帮’篡夺了国家政权,我们会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接下去的一年中,整个过去神学院的教员成为了新近建立的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丁主教被任命为南京大学的副校长(研究所在神学院恢复后撤销,因为所有的神学院教师不得不专注于培养神职人员)。丁主教认为这样的变化令人振奋。他一直是一位教师和学生的引导者,对这样的机会当然是欢欣鼓舞。他总是希望中国教会向世界开放,不要孤立自己,或者只是顾影自怜。在1979年给我的一封信中,他谈到了宗教研究所:

“我们真的是突破了我们的保守和孤立。无数次我觉得自己又成了基督教学生运动的秘书,和各种各样的学生和教师交流切磋。昨天有几个法国人给我们五个人摄像,我们在给同事们讲解为什么说宗教是个重要的课题。如果没有两个前提,这样地展现基督教的机会是不可能有的:其一是‘四人帮’政策的垮台,其二是对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作为中国基督教一部分的独立自主精神的张扬。”

65岁时的K. H. 进入了他生命中最富创造力的阶段。他继续发展他开放的观念,探究神学和生命哲学。他说中国基督徒不会忽视“在每个人

当中潜在的上帝形象”。在他的一次演讲里,他引用了老子的话: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

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

(《道德经》第25章)

K. H. 欣赏这些词章的优美。他从不把其他精神上的远见卓识看作是对基督教的威胁,而把它们看作是上帝存在的另一种显现。在另外的文章中,当他论及生命如同旅行,他注意到《圣经》中已经有许多这样的比喻,但人们也可以在其他文本中发现相似的言说。他引用了中国古代诗人屈原的长诗《离骚》,这首长诗写作于基督元年的前三百年:

吾将远逝以自疏。

遭吾道夫昆仑兮,

路修远以周流。

(《离骚》14)

不仅如此,K. H. 在无神论中也发现了有用的观点。他把无神论者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那些堕落的人,他们不愿意让上帝的信仰来影响他们糟糕的生活态度;第二类人非常重视上帝的概念,但他们无法接受这个概念——因为周围有太多的不公平和罪恶,他们认为一个真正法力无边的上帝是不会容忍这样的痛苦的;第三类是革命的人道主义者,他们拒绝上帝,是因为宗教信仰者的上帝看上去只是支持不公正的社会秩序,和压迫者站在一块儿。丁光训批评那些宗教信仰者错误的上帝概念,认为那会比无神论者更有问题。通过剖析对上帝认识的谬误,基督徒可以提升自己的眼光。这样的话,基督徒就会发现,其实,真正革命者的目标是解放和仁爱,

他们想要为所有的人争取自由和尊严。最后,革命的人道主义的理想和启蒙神学是不谋而合的。

正是这样的基督观,使得丁光训和其他人合作,投身于寻求正义、解除苦难的使命中去。丁光训遗产中一个持之以恒的部分便是爱德基金会。爱德基金会成为他“传教学”(他的神学或传教理论)的典范。“传教”是指教会在世上所做的工,也就是教会之所以存在的理由。教会并不是只构筑自己的权力和优先,而是和所有带有善良意愿的人合作,把救治、正义、尊重、爱和解放送达每一个人。

过去,很多基督徒固执地认为教会的使命就是建设各种机构——学校、医院、慈善部门——它们都掌握在教会手里。如果这些机构是教会在运行,那么它们就都被认为是“基督教”的。

爱德基金会却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构想。它建立在这样一个理念上:教会中人和其他拥有相同价值观的人可以一起有效地合作,开展教育和医疗工作。爱德基金会并不掌控在教会手里,它也不是只为基督徒服务或者优先为基督徒服务。它代表着基督徒和世上的其他人同心协力,去支持和帮助那些其他宗教的或者是非宗教的人群的所需。

爱德基金会只是丁主教当下基督徒生存观的一个实例。他和佛教徒、道教徒、伊斯兰教徒、无神论者、不可知论者,以及其他那些致力于创造一个更公平的世界的人们愉快地合作。K. H. 不希望基督徒自我封闭,孤芳自赏,神秘兮兮,或者作茧自缚。他始终认为基督徒唯一正确的选择是向世界开放,积极投入更广阔的社会。

丁主教一生所留下的遗产不仅仅是给中国基督徒的礼物,也是给予整个中国社会的馈赠;它不仅仅是给世界基督徒的礼物,也是给予整个世界大家庭的馈赠。